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ATION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文明的共振与发展

——中日文化关系研究

胡令远 著

时事出版社

文明的共振与发展

——中日文化关系研究

胡令远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共振与发展: 中日文化关系研究. 胡令远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3

ISBN 7-80009-793-5

I. 文… II. ①胡… III. 文化交流-中日关系-研究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195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45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弁 言

在国际关系中，文化的因子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特别像对于既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同时又背负着甚深的民族恩怨之重轭的中日两国来说，应该更是一饶有探索价值的问题。

遥想当年，大和民族的先觉们，乘槎浮海，经千辛、历万苦，采得中华文明之火，俾蹢躅行于海外荒岛的先民们，迅速脱离蒙昧时代，从而附丽于一种先进文化，获得民族发展的长足进步。

然而，曾几何时，大批中国人东渡扶桑，求学问道。虽说是“欲西（汲取西洋文明）而徂东”的意

味，但此时的日本适足以成为可以效法的楷模——昔日的学生何以变成“半个”先生，个中的起承转合，是颇耐人寻味的。它告诉我们，相关国家、民族间，如果存在发展水平的落差时，就会产生文明的共振现象。待她们“聚碧一泓复东流”时，应该已是在另一层次的文明水准上了。而在这一过程当中，往往会有角色转换的情形发生，特别是在转换之际，两国关系也会随之变化——这从圣德太子积极汲取中国文明到福泽谕吉激烈批判中国文化乃至鼓吹“脱亚论”——其间中日关系的情形可以明了。也就是说，对待一国文化的态度，与两国间的关系是有密切关联性的。

然而，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往往被忽视，这与它在一国之内的命运相一致。而我历来认为，文化虽然往往被赋予“亚位”，但却具“A性”性质。虽然人们在谈到构成一国或国际关系之要素时，一般总是以“政治、经济、文化”，或“经济、政治、文化”这样的轻重缓急之顺序加以排列和说明——“文化”大体总处在“亚位”。所谓“A性”，即人们普遍承认的相对于政治、经济的易变性，文化的作用则

非一时一事，而是更具恒常性；并且相对于政治、经济的表层性，文化则具有在背后起作用的深层性——从这一意义上，文化的作用相对于政治、经济来说，又具有一种超越性。而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愈来愈理性化，这就为文化的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引起的轰动，可以说并非空穴来风。

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以及重要性，我们也可以由中日关系的情形得出结论。譬如，作为两国政治基础之一的历史认识问题，给予现实的中日关系以极大影响。然而，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即只靠政治上的诉求是难以解决的，而且必须由双方在文化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如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与日本的文化习俗有相当的关联性；而中国由于儒学的关系，也即是一个道德大国，因而对“道义”的诉求，是十分执著的。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所持的态度啧有烦言，甚至认为是当牌来打——这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缺乏理解。可以说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往往是解决国际间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不由得想到鲁迅、郁达夫都曾告诫过国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有爱好和平的一面，也有相反的因子。在中国日渐强大起来的今天，先贤们的话，在我们思考和处理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时，是应该特别措意的。

这本小书是笔者近年有关中日关系，主要是文化关系的一些思考。举凡文学、文化、文明、伦理等皆有涉及，不揣浅陋，献芹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感谢苏绣芳女士、宿景祥先生、时事出版社的领导及从事编校的朋友，这本书得以较快付梓，离不开他们的指导与辛勤工作。

胡令远 谨识

于春申江畔

2003年10月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源流之间——中日文学论 (1)

一、中日小说艺术的“文备众体” (1)

二、日本文学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 (22)

三、中日文学艺术的差异性 (37)

四、在中日文学的源与流之间 (49)

第二章 同异之间——中日文化

论 (上) (63)

一、周氏昆仲的日本文化观 (63)

二、周作人日本文化研究特点发微 (75)

三、中国江南文化与日本文化 (90)

第三章 回归与重构——中日文化

论 (下) (102)

一、回归与重构 (102)

二、战后中日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的

再构建 (119)

三、战后日本的国际化于当代中日文化关系

之意义 (156)

第四章 共振与发展——中日文明论 (171)

一、西洋文明于中日两国的意义 (171)

二、文明的冲突与中日两国的命运 (194)

三、日本文明的宿命与国际关系 (208)

目 录

第五章 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

——中日比较论 (224)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 (224)

二、巅峰与低谷之间 (240)

三、从“虚幻的乐园”到回归自然 (251)

附 录 (译文四篇) (266)

一、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 (266)

(一) 日本模式的构造特性 (浜口惠俊) (266)

(二) “日本文化论”的变容 (青木保) (296)

二、人物研究资料 (315)

(一) 日本的周作人研究 (伊藤德也) (315)

(二) 日本的屈原及楚辞研究 (新田幸治) (331)

第一章

源流之间——中日文学论

一、中日小说艺术的“文备众体”

清末学者王希廉曾评《红楼梦》云：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典、对联扁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匠作构造、花果栽培、禽鸟饲育、针黹烹调，巨细无遗。可谓包罗万象，其别部小说能望其项背（《护花主人总评》）。于此，王氏于激赏《红楼梦》涉及的内容及表现手法之丰富的同时，也揭示了小说所具有的“文备众体”——这一综合性文学样式的重要特征。

所谓“文备众体”，即兼具多种文体之意。特别是长篇小说，融会了或作者自作、或引用他人之作的大量诗词歌赋，用以表现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或借以抒发人物强烈的情感，或制

造某种特定的氛围——由此，则增加了小说表现手法的丰富性，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使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这一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皆有异曲同工之妙。

于此，先以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红楼梦》为例，试加以说明。如《红楼梦》的男女主人公们经常举办诸如“菊花诗”、“螃蟹咏”等所谓饮酒赏花的“诗会”。于其间，彼此争奇斗艳、尽显才华——而由诗的工拙雅俗，则可知作者的才情性格。如林黛玉的“葬花吟”、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等，皆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深沉丰富的内心情感，使读者欲掬一把同情之泪，堪称千古绝唱。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其他表现手法所无法达成的。

此外，其在小说意境、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也具有特殊的效果。如《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中，写宝玉去看黛玉，由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时，有如下的描写——“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到‘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不过二年，便也要‘绿叶成阴子满枝’了！”^①在这里，宝玉面对桃红柳翠织成的一幅绮丽景色，首先想到的却是苏轼词中的——“花褪残红青杏小”，而暗含着繁花似锦背后的物换景移。你看像邢岫烟这样的如花少女，而一旦为人妻、母；又忽一日“乌发如银”、“红颜似槁”——真真是情何以堪！这时，浮现在宝玉脑际的，也就只能是杜牧的“狂风吹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的诗句了。

诗词的穿插应用，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巧妙。也只有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才能切合此一情景中悲物、恼人、伤心——作为“多情”公子的主人公的性格和教养，才使“景”、“情”、“人”融为一体，从而达成一种美的艺术境界。难怪可以说是《红楼梦》的权威评论者的脂砚斋曾指出：此书之妙，皆由诗词句中出（庚辰本评语）。

对于小说的所谓“文备众体”的特征，于此只以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且又仅以其中的诗词歌赋——一类韵文为例，简略分析了其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情感的表达及特定意境的创造上所起的独特作用。前已言及，与此有同工异曲之妙的，是比《红楼梦》要早数百年、由紫式部所创作的日本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这部创作于11世纪初的小说，除引用了八百余首和歌外，借用汉诗的地方也多达一百八十余处。其中，仅白居易的诗即有四十余篇。如小说开篇的“桐壶”，其内容即是由白乐天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敷衍而成的。作者把和歌、汉诗巧妙地融合在小说的情节或结构中，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如第一回写主人公源氏年仅三岁，其母更衣便不幸病歿。而天皇对更衣朝思暮怀，悲伤不能自己。遂于朔风乍起的深秋的一天，遣命妇赴外家存问。事毕将命驾于归途时，夜已深了。小说叙述道：“其时凉月西沉，夜天如水，寒风掠面，顿感凄凉；草虫乱鸣，催人堕泪。命妇对此情景，留恋不忍遽去，遂吟诗道：‘纵然拌着秋虫泣，哭尽长宵泪未干。’吟毕，还是无意登车。太君答诗……‘哭声多似虫鸣处，添得宫人泪万行。’”^②这里，以瑟瑟秋风、寂寥秋月为背景，两首和歌皆借秋虫悲哀的鸣唱来表达人世间的悲伤。而能够表

达这种情景下的真情至感，也许只有以“物之哀”为特征的和歌最合适了。而它又与该回小说之悼怀早逝者、悲悯失恃人的整体氛围是那樣的切合。无论是前述贾宝玉的伤怀，还是这里的伤逝——汉诗与和歌所表达的至情是人类共通的：其艺术感染力，在中在日，并不稍异。

又如在艺术一面被推赏为《源氏物语》压卷之作的第十二回“须磨”中，小说主人公源氏满怀离情愁绪乘舟往须磨途中，来到一称之为“大江殿”之处时，书中写道：“其地异常荒凉，遗址上只剩几株松树……回顾来处，但见云雾弥漫，群山隐约难辨，自身正是‘三千里外远行人’了。眼泪就像浆水一般滴下来，难以抑止。”^③至此，源氏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这次被政敌从京城赶到这流放地的自己身为何物。将这荒远之地与源氏心情恰切、凝练地表现出来的，是“三千里外远行人”的白居易诗句。白居易《冬至宿杨梅馆》诗云：“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远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一病身。”^④身居荒僻的边鄙之地，而“长夜”、“独宿”、“冷枕”、“单床”、“病身”——流放者生活的寂寥、痛苦、无奈，皆由这一句诗而使人联想起来。这样的一种表现手法，不仅简洁，而且意味深长，苍凉的身世之感，跃然纸上。

又小说同一回中写道：“此时一轮明月升上天空，源氏公子想起今天是十五之夜，便有无穷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清凉殿上，正在饮酒作乐，令人不胜艳羨；南宫北馆，定有无数愁人，对月长叹。于是凝望月色，冥想京都种种情状。继而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感动流泪。”^⑤源氏于此所诵读的诗，为白居易《八月十五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中的“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如诗题所示，中秋之夜值宿翰林

院的白居易于节日之际，对远谪潮湿烟瘴之地——江陵的好友元稹十分挂念，并将此“每逢佳节倍伤神”——对好友的深挚怀念之情融入诗中。而被放逐须磨的源氏，平时即难以忘怀京中往昔的生活，更何况满月当空的佳节，浮想联翩中，借此诗句以表达无限的感慨——因为自身是遭放逐者，故身世飘萍之感、感念故旧之意，怕比白氏只是遥念旧友还要深切和强烈吧！因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自然也就收到感人至深的效果。像这样在准确把握原诗诗意及背景之上，又加以灵活运用例子，在该小说中可以说不胜枚举，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是强烈和多样化的。

其间，譬如由于中日文化的交流，大家运用同一句诗，表达了异国间的同一主题，似乎因了文化的纽带，一下子拉近了中日两国地理及民族间的距离。所以，小说的“文备众体”不惟有艺术上的审美之效用，在有文化渊源关系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它还可以发挥增强“亲和力”之社会功能。

《源氏物语》借汉诗以敷衍故事，将和歌、汉诗大量地运用于小说中，不言而喻与作者丰富的学养及坚实的汉文学功力是密不可分的。而在形式一面，与中国的唐代传奇也不能说没有关联。

《源氏物语》大约成书于日本一条天皇宽弘四年（1007年），即中国的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这一时期，在中国，由唐代传奇小说肇始的文言小说的创作过了高峰期，而以讲史、评话等后期白话长篇小说的雏形为代表的讲唱文学已然勃兴，小说创作的观念亦以明确的形态被显示出来。在中国小说史上，唐代叙事文学的作家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创作小说的新纪元，表明中国小说创作的真正启航——也即鲁迅

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唐传奇往往以叙事诗提供的故事、人物、背景为蓝本，再利用抒情诗所创造的意境，并与人物的塑造相辅相成，由此产生了不少优秀小说。这种情形，与在唐传奇时代勃兴的被称之为“变文”的一种讲唱文学有共同的特征——即将韵文与散文相互混用，特别是善于用诗词歌赋描写人物、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可以说是在中国小说创作之初就有了，也可以说是中国小说与生俱来的东西。不言而喻，此即所谓中国小说形式上的“文备众体”现象。

另外，它似乎还与当时唐代人所说的“温卷”的风习有关系。即唐时的读书人，于诗歌而外，往往还将创作传奇小说作为立身处世的手段之一。所以，他们竭尽所能，以小说来显示自己所具备的多种才能。宋朝人赵彦卫在所著《云麓漫抄》中曾谈及这种情况，他指出唐时的举人们，往往需凭借当时的有力的显要向有关主管部门转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由本人投献所业。且过数日，需再去投献。以故，世人谓之“温卷”。如《幽怪录》等，皆为此类。

其中，若能充分利用小说“文备众体”——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尽可能显示自己的诗笔、史才、议论等的功力和才能的话，功名也就不难而致。而欲达到进士名号，还须多多创作诗歌，才能成功。由此可以明了，唐传奇是兼具韵文和散文的。这也是后来的小说之所以形成“文备众体”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以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来吸引读者的自身要求，也是其成因之一。

唐传奇的早期杰作、对日本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如所周知，是张鷟（字文成）的《遊仙窟》。成书于八世纪初的这

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所写的恋爱故事，描写的实际上是唐时的士大夫们的冶游生活。在小说的构成上，为韵、散结合，穿插进大量的诗歌及四六骈文，文笔优美流畅。后来，这部小说在中国长期散佚。但当初它传入日本之后，给予日本文学以极大影响。如成书于八世纪的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以及《和汉朗咏集》中，都分别收录有《遊仙窟》中的诗歌。又日本最早的汉文小说《浦岛子传》的构思、情节、语言表现方式，乃至名字等，皆可见《遊仙窟》的痕迹，具体可参见本章第四节。此外，特别是《遊仙窟》这种韵、散结合的美文形式，对于日本的“歌物语”、“物语”文学，也给予很大影响。

据日本学者的考证，《源氏物语》的作者，其手头的小说并不多，但《遊仙窟》一定是常置身边的。《源氏物语》中，有数处引用《遊仙窟》中诗文的地方，一些场面的描写也非常相似。不言而喻，在唐传奇中，《遊仙窟》是给予《源氏物语》以深刻影响的最主要的作品。除此之外，以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为素材所写的唐传奇，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数次为紫式部的小说所引用。

由上可知，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古典小说，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皆与中国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如《源氏物语》作为世界上最初之长篇写实小说，不言而喻，有着自己的艺术再创造。譬如，仅仅引用汉诗文，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难以表达日本人独具的纤细的思想情感，所以还必须进行和歌的创作和引用，小说也就带上了“俳味”。至于紫式部在构思、创作过程中，何时借助汉诗文、何时需用和歌，则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这是与包括